

# 國父革命與地理環境 及歷史淵源

莊 政

## 壹、前言

尋根問底、窮本溯源，研究 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由來，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，若欲求其完備，恐怕要寫一部專門的著作。但這並不是一個新鮮的題目，試閱任何一本中山先生的傳記或有關其思想、行誼等的論著，幾乎多多少少都曾提到這點。問題是較為完備的論述與研析，直到現今，殆不多觀。筆者有感於此，窮思苦研，歷有年所。前曾擬定綱目，唯恐不夠周延，乃請教高明，承蒙指點，有所增益。然為審慎起見，亦祇能說獲得初步的綱要而已。姑將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由來，先則概略區分為「客觀因素」與「主觀條件」兩類，實則此乃原則性的，非如「以刀切瓜」似的嚴格畫分。旨在便於記誦與論列耳。以言客觀因素，至少可分為地理環境、歷史淵源、時代背景及社會關係，本文格於題旨及篇幅，則僅及於前兩項的研析。

## 貳、國父革命所受地理環境的影響

地理環境對一個革命家、思想家的影響至深且遠。試想假如中山先生長於新疆、蒙古等西北邊陲地區，一部中國近（

現）代史勢必改寫。而他生長在廣東就大不同了。爲便於行文而言之有序，首先探討先生的故鄉廣東省香山縣，自然包含了翠亨村；次則介述中國與西方文明的觸角——金星港、澳門與香港；後者對中山先生的影響最大；最後則以歸納方式，列舉若干因接觸西洋文化、接受歐美教育而倡導改革或開風氣之先的香山縣籍知名之士。當然，中山先生爲求知和革命，半生周遊世界，行踪萬里，各地的環境或多或少皆有影響，檀香山即一顯例，惟斯篇僅及廣東耳。

## 二

廣東省與海南島兩地處於中國南端。香山縣是廣東省郡外戶，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南部；正當東、西、北三江的出海處，而濱臨南海，屬於亞熱帶氣候。其南端爲澳門，東達香港、北通廣州，是廣東省水道及海運最發達的地區，水陸交通，咸稱便利。其西北接連內陸。北與番禺、順德二縣爲鄰，西與新會縣爲界，東南臨海，控珠江口；東與寶安、東莞二縣遙遙相對，南面汪洋，「水流浩蕩，海外島嶼，星羅棋布，氣象萬千。」（註一）

香山縣陸地遼闊，超過廣東全省九十七縣每縣的平均地積（二、二五三·七五方公里，而香山縣面積爲二、八七六·七五方公里），堪稱粵省之一大縣。倘以三粵的精華區——廣州三角洲的八個縣面積的平均數比較，那就更占優勢了（註二）。自北宋熙寧年間（約於一〇六八年前后）香山形勢漸見重要，宋乾道五年（二七〇年）正式設縣治后，民物繁殷，與時俱增。至於香山縣的命名，約有三種不同的說法：其一、「舊縣名，宋置，明清皆屬廣東省廣州府，以其地有香爐山得名，民國改爲中山縣。」（香爐山——在廣東省中山縣境，亦曰香山，舊時縣名曰香山。）其二、相傳香山縣山中盛產「沉香」，故名。其三、因地處亞熱帶，三冬無雪，四季常花，氣候適中，風景宜人。「草經冬而不枯，花非春而亦放。」（「香山」二字，即因多芬芳花草而得名。據清道光朝香山縣志載：「廣州濱海縣七，而香山獨斗出海中，勃鬱靈淑之氣，與南澳奇甸爭雄，洵屬沃土奧區也（註三）。」果如斯，足見香山縣地理環境優良。

至於整個香山縣的地形地物，地理家有簡要的說明：

本縣山地居縣境之中，北接本縣平原，南接海外島嶼，成西南而東北偉大之地帶，面積逾一千二百五十方公里，佔全縣面積百分之四十，爲廣州三角洲最大之山地，山地大部高度約在二百三十公尺以上，地勢主要爲花崗岩而成，

土壤較劣，人口稀疏，耕地狹小，僅得旱作或坑田，山中草莽，荒蕪不治，產業不興，較之平原，何止天壤，地利未盡，至爲可惜。山地地勢，懸殊至甚，高如峰巒，低如谷地，廣如海濱，狹如山隘。地勢上、水文上、產業上、交通上，甚至人民生活，皆有複雜的表現。（註四）

上述的地理環境與清季革命運動的發軔與勃興關係至爲密切。因爲廣東之所以成爲近代中國革命的策源地，其與地緣及歷史因素息息相關。中山先生曾譽洪門會黨爲老革命黨，廣東乃洪門會黨繁盛的地區，而香山縣又爲洪門會黨活動的中心。這可從香山縣的地形方面找到明確的答案。綜觀該縣的北部爲平原，頗適於耕種，物產豐富。蓋其「田疇雄偉，西江幹流，自此出口，……。平原地形，山地地形及海岸地形畢具之，地形複雜，較三角洲各縣爲甚，地力之富庶，物產之繁多，爲三角洲之冠」（註五）。具有這樣優良的條件，當可充作秘密結社所需糧食的補給線。其中部爲山區，群山叢險，五桂峰懸，面積佔全縣的十分之四，地形錯綜複雜，正當秘密結社賴以謀生發展的理想根據地。至於東南部三面環海，其南端爲澳門，臨近香港等島嶼，星羅棋布；三角洲向爲走私等下層社會的地盤，適宜從事秘密活動。一旦有警，易於逃躲。這種天然環境形成了會黨求生存與滋長的樞紐，其對反清興漢的革命運動，自有涵育勃興之功。

考諸洪門的反清運動，早已深入兩粵民間，道光年間，香山縣會黨迭會起義，如石門鄉甘秀，即其著者。該鄉與翠亨村爲近鄰，流風所及，中山先生生長的故鄉久爲民族思想發皇之地。足見人文環境的薰陶，自然影響了一代偉人，而歷史上血的教訓，尤足啓發其高潔的情操與民族意識。

中山先生誕生於香山縣的翠亨村，該村原名「菜坑」（一稱「蔡坑」），位居縣之東南，乃一小村落，背負犁頭山，臨珠江、南海。北距縣城（石岐）五十八華里，南距澳門七十四華里。東南方隔海與香港、九龍遙遙相對。「負山瀕海，地多砂磧，土質蹺劣，不宜於耕，故鄉之人，多游賈於四方」（註六）。雖然地質貧瘠，出產不豐，但因該村背負犁頭山，瀕臨珠江、南海，群山環抱，峰巒挺秀，清溪綠蔭，佳景天成。「因爲地方是屬於熱帶，氣候總是溫和的，樹木終年濃鬱著綠蔭，山野四季更開滿了各式各樣的花。這環境是好極了，這對於中山先生偉大性格的長成，是有深遠的關係的。」（註七）

由於古樸的翠亨，一如其名，風景如畫，可供賞玩，水陸交通便利，吸引了許多廣州、澳門的富翁，興建各式各樣的

別墅於此。於是使得農村的鄉下人跟城中市民時常接近，後者樂於介紹其種種見聞，使前者的意識和心智大為靈敏。

## 三

在香山縣東岸，翠亨村與唐家灣之間、珠江口外，有一縣屬的淇澳島，又名金星港，為中外交通的樞紐。不但是一良好的避風港，且為清廷允許外國輪船停泊的唯一口岸。因係勿須納稅的自由港，一切可自主，不像港、澳輒受外國人的控制與欺壓。而況金星港位於廣州、澳門、香港三大商埠之間，基於地利，形成優勢，與外界接觸至為頻繁，西洋文化隨著商品遍運各地，自然刺激了當地縣民遠航謀生的意願。很多人富於冒險精神，因通商而致富，無形中也多少負起了溝通中西文化的責任。

據林百克（Paul Linebarger）所著「孫逸仙傳記」云：

那時清政府不准外國船隨意停泊，特指定金星港為外人泊船之所。……翠亨村和金星相距甚近，所以港上的事情，這村中質樸而稍稍啓發的人民都可以知道。……中山幼時，很喜歡聽人講港上的事情，……那時他家有一位寄居的老叔母（按係中山先生二叔學成公寡妻程氏夫人），她是從金星港的市外搬來，很熟悉港上的事情，並是很健談的。她一次對中山說：這些外國船舶在港上是很可怕的，因為船上常發現奇怪的事情，這些外國人金錢是很多的，他們穿著奇怪的衣服，頭上沒有髮辮，也有並頭髮都沒有的，但是他們有很多像火一般的鬚鬚，他們用銳利的刀子吃東西，常在他們常用的槍裡出烟。……中山課餘在田野間幫助家人工作的時候，心中常想，外國人既有種種使人不安，他們一定有值得研究的事情，……這樣推究事情的精神，後來便是這改造家成功的基礎（註九）。

中山先生自幼曾遇一自美國返鄉的僑商，聽他講述美國加州開發金礦的故事。時有紅人為截路強盜，專幹殺人劫金的勾當。最使中山先生終身不忘的是，那位僑民總把攜帶的黃金分藏兩處，一為強盜所易見者，一則置於極隱密之地，強盜縱將前者搶去，猶可保留後者。否則，如將全部黃金隱藏，強盜得不到金子，就要殺人。中山先生覺得這位僑民在取與的世界中，獲得一種實益而特殊的哲理。

金星港及舊金山等新奇的故事，啓發了他自幼即生冒險出洋遠遊之想，等到他十三歲那年，終於夢圓成真了。

澳門位於中山縣的東南端，珠江口西南是一個面積五點二七方公里的小角落，相距翠亨村五十八華里。舊名濠境，因其地有天后宮，土人稱爲「媽閣」，故西文譯名爲 Macao，又稱「媽港」。

緣自十六世紀中，歐洲人始向海外擴張探險，世界變化從此肇端。西歷一五一七年，葡萄牙人直抵廣州，經過二十年的衝突與交涉，終於達成協約：明嘉靖三十二年（一五五三年），廣東地方官准許葡萄牙人「借濠境地曝諸水漬貢物」，「久之遂專爲所據」（註一〇）。明嘉靖間（一五五七年），租賃與葡萄牙人通商，崇禎初，葡始設官；清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年）立約，許其永遠管理，但不得讓於他國。我國於此設關徵稅，名「拱北關」。

明季，葡萄牙人既利用巧妙的外交手段佔據澳門，又僞借中國規定洋人船隻只准停泊澳門的限制，上下其手、左右逢源，竟然壟斷了中歐間的貿易。自一五一〇年葡萄牙人占據印度西岸的大市鎮果亞（Goa），即設立總督府。嗣後總督頒發葡人商船來往澳門的特許狀，價值七十餘萬兩白銀。足見該地與歐洲通商可獲巨利。當時歐洲所需要中國出產的大宗絲、茶，悉數集中於澳門，候船出口。然而歐洲產品尚未引起華人的興趣，致無實際的需要。所以歐洲東來的船隻以載客爲多，而以天主教傳教士爲夥。他們抵達澳門後，先則居留若干時間，入境問俗，研習中國的語文、風俗習慣，學有所成，再進入中國內地傳教。自然他們無形中也把歐洲文明帶進了古老中國的各地。無可否認對於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，傳教士確有相當的貢獻。

澳門和香港皆位於廣東南端，悉屬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南方霸佔的兩個殖民地的重要據點。他們利用中國窮人的勞力和富人的資本，分別在兩個地方建築成現代化的都市，變成十里洋場，各國貨物充斥，到處都是紙醉金迷、聲色犬馬之地，期在如此這般的花花世界中，以坐收漁翁之利。因爲要想盡量吸收中國人的勞力和金錢，就不惜多方面的迎合尋求快樂的中國人底心理（註一一）。不過隨著西歐舶來品的輸入，澳門與香港也就成爲中西文化滙合與交流的要衝之地了。

澳門本來就是香山縣南端的一隅，由於地緣之故，香山縣翠亨孫族對它並不陌生。中山先生之父達成公自二十歲至三十歲，在那裡度過了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十年之久。雖然他在此一充滿奢華之氣的都會出賣勞力，但他頗能潔身自愛，絲

毫未染不良習氣。後來他毅然重返家鄉。繼續更爲辛勤的耕農生活，並兼任村中更夫，有時把翠亨村的農產品運往澳門兜售，再購當地的工業產品帶回出賣，以博取蠅利、貼補家用。他自然會將在澳門的所見所聞告訴家人或親友。使好奇心切的中山先生，早生遠遊之想。

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年）五月，會有英輪由澳門載僑民往檀香山，中山先生央求老父，欲作遠遊，以廣見聞。母氏楊太夫人頗思一觀其長子德彰在檀之經營，達成公遂允同行。中山先生侍母經赴澳門時，目睹其地浮囂奢華，賭場、煙館、花船、妓院等充斥其間，深感厭惡。因憶書經五子之歌：「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，甘酒嗜音，峻宇雕牆，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。」不禁喟然而歎，感慨繫之。

## 五

香港在廣東省寶安縣南海中，值珠江口之東，北與九龍半島隔海相對，長約十八公里，濶約三公里以至八公里，相距中山縣約五十英里。港水甚深，能容巨船，號稱世界良港，譽爲東方明（珍）珠。其地本屬我國，於清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年）中英鴉片戰爭，爲英所佔；道光二十二年（一八四二年）七月二十四日（陽曆八月二十九日），中英南京條約（中國名之爲「萬年和約」）正式簽訂，包括割讓香港、通商、賠款、國交平等（註一二）。香港經英人銳意經營，遂成爲英國遠東海軍根據地；又因係無稅口岸，自由貿易繁興，商務極爲發達。且受西方的衝擊最深，幾成爲晚近以還中西文化交流之樞紐，地位益見重要。

香港可以說是國民革命的策源地。因爲經過英國人的法治精神與高度的行政效能，從在香港的治績中充份獲得了肯定，其與滿清變橫統治下的種種落後景況，適成強烈的對比。更激發了中山先生毅然從事革命運動，一心救國的動機。其後與中會時期的組黨與起義等，幾乎與香港密不可分。宜乎中山先生坦誠地指陳：「我的革命思想發源地即爲香港。」（註一三）

一八八三年十一月，十八歲的中山先生以毀神像，觸怒鄉人，被迫赴香港。旋入拔萃書院讀英文，次年四月，入中央書院就讀。「暇時輒閒步市街，見其秩序整齊，建築閎美，工作進步不斷，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」（註一四）。他每年

寒暑回故鄉二次，兩地情況相較迥異：香港整潔而安穩，香山却正相反。在自己生長的家鄉也不得安居，竟須自作警察以自衛，隨時留意防身器械是否完好。致常默念：香山與香港相距僅僅五十英里，何以如此不同？香港原係一小荒島，在英國人統治四十來年（案香港係於一八四二年割予英國，中山先生於一八八三年至香港就學，應算四十一年，始為正確），居然能成就如此偉績，而中國具有四千多年的文明歷史、莽莽神州，竟無一地能與香港比擬，這是什麼原故呢？

中山先生利用假期返鄉時間，帶頭從事修橋造路等地方公益事業，縣令允予資助。不料屆時他已調職，新縣官是以五萬元行賄而得，對地方建設毫無興趣。中山先生滿懷希望，頓成泡影，祇得回香港。先研究市政，再研究政治，結果發現香港政府官員都能潔身奉公，貪贓納賄事件絕無僅有，這和中國官場的情形却正相反。後來經過他實際的觀察，始知滿清政治愈到上級愈是齷齪，反而鄉村政治是中國政治中最清明的。他聽說西歐的良好政治並非固有，也是經過人為的力量加以改善的。從前英國政治也很腐敗惡劣，但因英國人崇尚自由，他們咸認：「吾人不復能忍耐此等事，必有更張之」（註一五）。有志竟成，卒達目的。中山先生從此獲得啓示：「爲什麼我們不能改革中國的惡劣政治呢！」中國對世界各地的物事都能模倣，而以改變政府爲首要之舉。「現社會中最有力之物，即爲組織一良好之政府」。因此他於大學畢業後，決計拋棄其醫人生涯，而致力於醫國大業，足見他的革命思想得自於香港。

## 六

由於香山縣三面環海，地處珠江口，交通發達，商業興盛，與外國接觸甚早。而葡萄牙人佔據澳門後，因中國限制夷人行動，凡屬中外貿易都須假手於中國人爲之經理，於是產生所謂「買辦商人」，香山縣民得地利之故，從事是項行業者甚多（註一六）。他們做爲中外商業的橋樑，無本生意，易於致富。且與洋人接觸頻繁，不免嚮慕西式教育，一有機會，樂於資送子弟出國留學，他們學成歸國，有的從事政治，有的鼓吹改革，有的宣傳教義，有的獻身教育……，部分人士扮演了社會大舞台上的重要角色。他們不一定贊成反清的革命運動，却大多數傾向於溫和的改革，然而他們的所言所行輒在無形中爲革命而鋪路。

如香山縣籍的唐廷樞（一八三二—一八九二），三代都是買辦，他的兩子及侄唐紹儀（一八六〇—一九三八）都被資

送赴美留學，紹儀歷任清末民初的政要。廷樞乃一八七四年上海「滙報」創辦人之一。徐潤（一八三八—一九一一）於一八八二年開設上海同文書局，是中國近代印刷出版事業的先驅。鄭藻如（一八二四—一八九四）乃香山縣濠頭鄉人，一八五一年鄉試舉人，曾主持江南製造局、津海關道，政績斐然。晚年出使美國日西班牙、秘魯三國大臣，為僑民力爭很多的權益，是非常傑出的外交使節。他的同里宗弟鄭觀應（一八四二—一九二三）乃清季改良派的健將之一，向極關心時務，先後刊布「易言」、「盛世危言」諸書，比較中外各方面的長短，激勵國人及時力求革新。

香山縣佔地理優勢，與外界接觸最早，若干早期留學歐美的先驅多屬該縣的青少年，舉其顯著人物如次：

中國第一位前往羅馬就讀哲學與神學的鄭惟信（聖名瑪諾，一六三三—一六七三），聰慧可造，十二歲半，即由法國籍天主教神父陸德（Alexander de Rhodes）偕同出國，途中歷經險阻、備嘗艱辛。居羅馬不到兩年，竟能完成四年的課業。曾受聘教職，講授拉丁希臘文法、文學。嗣攻神學，歷時六年。三十五歲學成返國，四十歲病逝於北京。他是天主教耶穌會第一位華籍司鐸，不幸英年早逝。他那卓越的才智、傑出的表現，被教友視為聖人（註一七）。從此耶穌教更加意培植中國傳教的人才。

中國第一位前往美國的留學生容闈（一八二八—一九一二），是澳門附近南屏鄉人。一八五四年畢業于耶魯大學（University of Yale）。一八七二年，清廷採納他的建議，選派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學，為中國謀求現代化開拓了途徑。有「中國工程師之父」美譽的詹天佑，就是其中之一，且屬香山縣人。

中國第一位留學英國的青年學人黃寬（字綽卿、生辰待考，一八七九年歿），與容闈同船出國求學，畢業於愛丁堡大學（University of Edinburgh），習醫數年，學有專精，畢業時名列前茅。一八五七年返國，擅長解剖學，曾任香港國家醫學院院長。對廣州博濟醫局頗多協助。其後廣州博濟醫院（Canton Hospital）人才輩出，中山先生和他第一位革命同志鄭士良，均曾就讀其附屬的南華醫學堂。

## 七

廣東是中國最南的一省，幅員廣大，風景秀麗，人口稠密，物產富饒。廣東人天性聰慧，很能吃苦耐勞，既充滿了幹

勁兒，又富於衝勁兒。因為地方觀念甚強，頗能團結互助。有人認為：「中國文化發展到嶺南，而中原哲學的特色仍在。……剛健中正，擇善固執。因此創造性特別大，反抗力特別強」（註一八）。爲什麼近百年來的中國歷史上許多重大舉措，無論革命也好，如三元里的抗英事件、太平天國的反清運動、辛亥革命；無論改革也好，如洋務的提倡、戊戌政變等，廣東人都扮演了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，上述種種，至少可以解答這問題疑難的一部分了。

十九世紀末期，由於滿清腐敗已極，不少仁人志士在海內外掀起了反清運動。爲什麼祇有中山先生成爲國民革命的導師呢？這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。林百克教授認爲：「在他用長時期的努力，推倒清廷的事業中，所表現堅苦卓絕、冒險奮鬥的精神和體力，不是從有益的天氣上得來，乃是他的強健體魄的農村生活和愉悅身心的家庭環境造成的」（註一九）。探究中山先生的家世，詢屬的論。

廣東省乃近代中國革命的策源地，清季反滿的革命運動，無論是組黨結社、籌募經費、集體起義與個人的激烈的壯舉（暗殺清廷大吏），以至宣傳等各活動，廣東省民及海外華僑（檀州及美州各地粵籍僑胞佔絕大多數）十之八九參與其事。而香山縣民與西方文化接觸的結果，主張政治改革者不乏其人，且列與中會籍者至夥。基於地緣因素，吾人若譽稱香山縣翠亨村爲革命聖地，當不爲過。

### 叁、國父革命與近代中國歷史的淵源

革命乃順天應人、弔民代罪的長期偉業，絕非一時訴諸情緒的偶發事件。辛亥武昌起義之前，革命團體甚多，莫不秉諸民族大義，以推翻滿清異族統治爲前提。由於革命的目標顯著，師出有名，衆志成城，終能傾覆清廷、建立民國。實則反清運動幾與滿清入主中原同時開始，不過，彼此端視勢力的強弱，互爲消長而已。從明末清初鄭成功據守台灣、結盟立社、領導反清運動；清季洪秀全起義金田、佔領東南、揭發排滿與漢之大轟；直到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，歷經挫

敗，卒底於成。雖因時空不同，處境有異，革命的內涵有廣狹，深淺之分，然而革命的目標皆以推翻滿清爲首要。可見反清的民族革命由來已久，代代相傳，一脈相承，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的（註二〇）。

如前所述，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形成的因素是多元的。大致說來，又可分爲客觀環境、主觀條件兩方面。至謂其與歷史淵源，祇屬客觀環境的一部分而已。本章係僅針對此，加以探討與介述。

## 二

研究中國的民性，大抵而言，越是北方人越顯得剛直而果敢，所謂「椎金革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。」所以北方自古以來多出勇猛的戰將與士卒。而越靠近南方，則越顯見寬柔而和順，所謂「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。」因此晚近以還，江南物產豐富，人文薈萃，成爲政治、經濟與文化的中心。既然東北、西北的民性比華北強，華北的民性比華南強，以此類推，江南的民性比閩粵要強才對，事實上却正相反。一般而論，閩粵的民性較爲強悍，地方色彩甚濃，同鄉觀念很強烈。如廣東人在一起總說廣東話，非常團結，頗具排他性，福建人也是一樣的；不但如此，既屬同里，尚有相互械鬥之風，往往打個你死我活。這畢竟是什麼原因呢？主要的是閩粵客民的祖先曩昔來自中原。最顯著的是：自唐朝末年，受黃巢之亂的影響，由安徽、河南、湖北、江西等地首次遷至安徽南部、江西東南部、福建西南部、廣東東北邊界等地。中山先生的先世本居中原，即以上述原因，輾轉播遷南來，由江西而福建、而廣東，遂定居焉（註二一）。

試想當時交通不便，他們處在國家變故，戰禍頻仍之際，背井離鄉，自北南遷，或間關萬里，或遠涉重洋，歷經顛沛流離，飽嚙苦澀辛酸，如果沒有健壯的身體，缺乏堅強的意志，又怎能經得起長途的跋涉，怎能忍受得住饑寒的煎熬呢？在中國近代史上，從三元里的抗英事件（林則徐的抗英大旗曾在香山縣城迎風飄揚；水師提督關天培曾在香山縣屬的磨刀洋面，與英海軍作過悲壯的激戰）。太平軍的反清運動、洋務的提倡、戊戌政變，以迄辛亥革命，其間無論是改革也好、革命也好，在政治舞台扮演要角的大部分是廣東人，因此廣東成爲革命的策源地，「華僑爲革命之母」（華僑多爲廣東人）。我們不談革命則已，否則若撇開了廣東，實在無從談起。除了廣東最早與外國接觸的地緣因素之外，很可以從歷史方面去找答案（註二二）。

廣東地處東南邊陲，原屬未開化的蠻荒地區，森林沼澤、舉步艱難；毒蛇猛獸，遍布各處；當地土著不時肆虐於客民；流行的瘴氣與癘疾足威脅生命……。在如此艱險惡劣的環境中，來自遠方的客民要想生存下去，隨時隨地要跟毒蛇猛獸搏鬥，要迎接土著的挑戰，要抵抗各種可能致命的侵襲，經年累月，長此以往，習慣成自然，自然養成了「堅忍刻苦、尚武好鬥」的英勇氣概；樹立起「剛健中正、擇善固執」的革命精神。總而言之，在中國，廣東人是民性很剛強、很突出的，因此「創造性特別大，反抗力特別強」（註二三）。

### 三

清代之初，為防明鄭反攻，嚴禁閩粵人民「通海」，乃有「遷界」之苛政，究其由來，請將鄭成功生平事蹟略述之。鄭成功原籍福建南安（一六二四—一六六二年），父芝龍、母田川氏，生於日本。聰慧、俊秀、舉止異眾，志氣非凡。七歲隨父返國讀書，十五歲中秀才，旋入南京太學，受業錢謙益門下，學業精進，智兼文武。唐王敗死，芝龍降清，成功痛哭諫阻，無效而別。嗣因清兵攻閩，田川氏遭辱自盡，成功悲憤，悉焚儒服。旋至南澳島，募兵數千人，與眾歃血訂盟，矢復故土。先佔廈門、金門二島，招賢練兵，縱橫海上。永曆十二年（一六五八年），成功親率大軍反攻，直達南京城下，清兵頑抗，殺殲殆盡。張煌言與之呼應，以偏師下蕪湖、取徽寧。聲勢大振，清廷甚恐，順治帝尤驚惶，欲逃關外。嗣因局勢逆轉，中原不易規復，為保持明朝正朔，於是圖取台灣為根據地，擊退荷蘭人，全台統一，積極建設，繼續清復明大業（註二四）。清廷唯防止明鄭自台灣再反攻，嚴禁閩粵諸省沿海居民與台灣往來，以免「通海」；下令彼等限期內遷五十里，高築圍牆，牆外一切破壞，堅壁清野，越界者定殺無赦，是謂「遷界」。雷厲風行的結果，製造了許多數不清的人間悲劇。例如：「墮縣衛城郭以數十計，居民限日內遷，逾期者，罪如之。功令既嚴，奉行恐後，於是閩粵江浙等省瀕海居民，老弱皆轉於溝壑，少壯流離於四方者，不知幾百萬人矣。」（註二五）

清康熙元年（西曆一六六二年，距清入關十八年），香山縣民奉令內遷時，皆留戀故鄉，不願遷移；當地的黃梁都，山深谷邃，易於藏居，許多居民相機隱匿其中。官兵揚言：只要點閱人數後，報告上級，即許復業。他們信以為真，按名自前營入，即遭格殺，無一生還。十餘年復界後，枯骨遍地，土民叢莽一阜，樹立石碣，曰「木龍塚」。至於被強迫內遷

的民衆，輒遭背遷的兵士恣意俘掠，而流離顛沛，生活無著，極爲悲慘；死於瘟疫者也不在少數。當時再三奉遷的香山等五縣沿海民衆，被所謂「先畫一界，而以繩直之，其間多有一宅而半棄者，有一室而中斷者。留以深溝別爲內外。稍踰步，死即隨之。生活委居捐產，流離失所」（註二六）。即使當時位居要津的滿清大吏也不諱言遷民所遭受的種種痛苦。如兩廣總督李率奏稱：「近因奉旨遷移百姓，棄膏腴而爲荒土，捐樓閣而就茅簷，赤子蒼頭，啼饑在道，玉容粉面，丐食於街，以至漸漸死亡，十不存八九」（註二七）。時廣東巡撫王來任亦奏云：「粵東之困苦，無知海邊，遷民尤甚。……或被戮而尸骸遍野，或被擄而骨肉星分，或被橫征而典鬻妻兒，顛連萬狀，罄竹難書，縱有一二遺黎，亦是鵠面鳩形，枵腹待盡」（註二八）。但因「遷界」之故，宗廟、祖墓、房屋被摧毀，財產與圖籍化歸烏有者不可勝數。致使遷民謀生無路，官逼民反，挺而走險。康熙八年（西曆一六六九年，距清入關二十五年），香山縣民曾聚衆起義，因寡不敵衆而敗，然其寧死不屈的反抗精神，却深植人心，歷久不衰。

康熙二十五年（一六八五年），海宇晏平，清開海禁，設江、浙、閩、粵四海關，遷界令取消，准許遷民返鄉。江山依舊，人事已非。斷傷過鉅，元氣難復，致使子遺勾起國仇家恨，義憤填膺，乃思以各種方式，矢與清虜拼。

中山先生的故鄉夙多秘密結社，清初，香山縣瀕海會遭遷界之害的鄉村和小島，便成爲洪門會黨活躍的樞紐了。

由於歷史與地緣的關係，香山縣的會黨活動頗多，據「香山縣志」所記載：

一 嘉慶七年（一八〇二年），惠州會匪亂，延及廣州。邑四大兩都、隆都、古鎮，所在皆有，而黃梁都尤甚。

一 八年春，會匪餘孽遁外洋，遊掠大小虎浪白諸處。

一 道光二十二年（一八四二年），三合會再起，始事者石門甘秀，據老巢嘯聚，至於劫掠拒捕者，則隆都高明遠、周配琚也。

案香山縣所分布的四大兩都與黃梁都，都是當年被遷界的地區。抗清最激烈的黃梁都就是遷民被無辜殘殺後，集體葬於木龍塚的，當地居民與會黨接觸頻繁，其來有自。香山縣天地會再起的領袖甘秀就是石門鄉人，其先世於康雍年間從東江遷移而來。石門鄉在香山縣大字都，恰與翠亨村爲近鄰。中山先生的故鄉，實爲民族思想早已發皇之地，他後來底心血結晶——提出那救國濟民的偉大方案，與其少年時的環境具有密切的關係（註二九）。

總之，人文環境的薰陶自然影響一代偉人（註三〇）；而歷史教訓尤足以啓發民間的反清意識（註三一）。在充滿了濃厚的傳統革命精神的廣東，培育很多的革命先驅者，中山先生是在這種特殊環境中最為特殊的一位革命偉人。

#### 四

自滿清入侵中原後，各地漢族抗清運動紛然並起，不絕如縷。嗣因大勢已去，一時實亦無法挽救狂瀾於既倒，乃將民族意識潛寄於民間，其方式約有二：其一、組織秘密會社，以勞工、農民等下層社會成員為主，以互助團體相號召，以忠義氣相標榜，期在官方不察覺中，進行「反清復明」運動，有如藏金於土，行跡極為隱密而詭異。其二、舉行菊花（或蓮花）詩會，蘊藏民族精神。如果說組織會黨是武的，憑刀鎗直與清虜血拼，那麼，舉辦詩社則是文的，乃憑藉筆桿發抒高潔的民族情操，保存民族意識。它是以文人雅士等上流社會為主的，鄉紳固為主要的成員，即使官吏亦不予排斥。而且這種組織也是半公開的。

中山先生說：「洪門者，創設於明朝遺老，起於康熙時代。」清史學者蕭一山教授據此研究考證：「斷定所謂『明朝遺老』者，就是當時輔佐鄭成功開闢台灣的陳永華。在洪門中稱作香主陳近南的，即陳永華自謂也，而洪門中的大哥，暗中即指鄭成功，因為那時鄭成功業已去世，故虛設此位，也和鄭氏奉永曆帝的正朔是一樣的意思。」（註三二）蓋自滿清入主中原，漢族飽受亡國之痛，然在異族高壓政策統治下，無法作正面的抵抗，只好採取迂迴的手段，利用各種詭密的方法，在統治者不知不覺中，把民族主義潛寄於一般下層社會，於是乃有秘密結社之產生。

太平天國跟洪門會黨的關係很密切，其所有的制度、文字等，殆皆因襲洪門。例如，洪秀全發展的詔諭，全用詩句，乃承繼洪門的作風，他和馮雲山早年曾加入洪門，嗣覺其組織散漫，難成大事，想借宗教的迷信以糾合群眾，於是創拜上帝會。等他得勢後，却把洪門一脚踢開，而別開生面，數典忘祖，這正是他難逃敗亡厄運的最大原因。

中山先生自幼生長在洪門活躍地區，流風所致，耳濡目染，自受其影響。及長，所接觸的師友多屬洪門中人，後來他也加入了洪門，並居領導階層。宜乎他對海外洪門昆仲常說：「你們都是老革命黨」（註三三）。實因洪門乃近代中國最大的革命集團，過去稱為「秘密會社」，以現今的尺度衡量，就是一個革命黨（註三四）。後來的事實發展：海外洪門輸

餉，慨助革命；國內各地會黨相率加入新軍，辛亥武昌起義一舉功成，這往往要追溯到幾百年前的民族革命。

香山縣境左上方的西北角有一個小攬鎮，民情勤勞刻苦，社風淳樸敦睦。自乾隆四十七年（一七八二年）開始，該鎮舉行菊花詩會，乃是繼承明末忠臣義士何吾驪、李孫宸等創立「文虹社」的餘緒。其表面上是以詩文會友，乃一風流儒雅的民間藝文活動，實則以物喻人、以詩抒情，他們深諳「詩言志」的道理，蓋詩可以言、可以觀、可以興、可以怨。具有如此多方面的功能，於是，乃將沛然莫之能禦的民族大意潛寄於字裡行間，弦外之音，尤足感人。每逢菊花大會開幕，「四方來觀者千萬人，雖農夫牧豎從芳馥中行，亦旋改其面目」。綜觀有關歷史文獻，自嘉慶十九年（一八一四年）以後，歷一百二十餘年之久，其間歷屆文藝菊會的詩聯，皆以秋菊傲霜，比喻人須保全晚節。「涵義深遠，用心良苦，利用『詩言志』的傳統精神，刻意抒懷以團結不忘朱明的同志。這和福建各地多以蓮荷詩會，號召同志處污染而不染，同聲相應。」（註三五）

以上所述，不過舉例而已。香山縣風氣所致，本多忠義之士，此不限於文人志士，包括武弁，亦如斯。至于其他的鄉鎮，也和小攬鎮一樣，如古鎮也是當年遷界區，居民所受的創痛既深且鉅，難以釋德。雖經過一百多年之後，這種刻骨銘心的民族仇恨依舊激蕩於民間，以至掀起了多次的人民抗清運動。其對後來的革命多有啓導作用。

中山先生的祖先來自中原，挾以堅毅樸實的秉賦。輾轉播遷香山縣後，久受當地居民因飽嚙遷界之苦而益恨滿清心理底影響，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強烈的民族意識。綜觀其先世，於有清一代從無應試入仕者，孫族既非出身於所謂「書香門第」的世家，自無傳統的「精神包袱」。中山先生早年即醉心向學，有志於革命。一見不對，說改就改，義無反顧；一以貫之，這與他出身於純粹的平民家庭，自幼生長在充滿抗清思想的香山縣，很有關連。

## 五

歷史學家幾乎都承認：洪（秀全）、楊（秀清）起義與國民革命運動具有密切的關係；在晚近中國歷史的淵源上，後者顯然頗受前者的啓發與影響。如清史學者蕭一山教授認為：從延平結社（明鄭創立洪門會黨於台灣）、金田起事（洪、楊崛起於廣西桂平縣金田村），直到中山先生所創導的辛亥革命，有如履霜堅水，積漸而成的。祇是隨著時間與環境的變

遷，革命的內涵自有廣狹之不同而已。因此他說：鄭成功領導的反清復明運動是「一民主義」（民族革命）；洪秀全創始於太平軍起義是「二民主義」（民族革命、社會革命）；孫中山創導的國民革命是「三民主義」（民族革命、政治革命、經濟革命）（註三六）。

考諸太平軍的成員，以兩廣人民爲最多。太平天國覆亡後，部分官兵解甲返鄉，復業務農；有的則流落各地，成爲游民而加入會黨。當年參加太平軍的一位翠亨村籍的農民馮爽觀，於太平軍解散八、九年後，重返故鄉種田。當時聊天成爲農村居民的主要休閒活動之一；而宗法社會的傳統，年高德邵、經驗多、閱歷深的長者，往往具有無上的權威，無形中成爲後生晚輩崇拜與請益的對象。這位退役的馮姓老兵，每逢早晚經常坐在孫宅門前榕樹下乘涼，他每每不自覺地挽起衣袖，露出傷痕斑斑的胳膊，這是與清兵激戰時，被敵人用刀鎗猛刺留下的傷痕，他對著村童們暢談自己如何參戰，當年與清兵作殊死鬥爭，洪秀全、楊秀清等之爲人，太平軍官兵們英勇的戰蹟，以及各地民情風俗等故事，一段一段地講述，興高采烈、眉飛色舞、如數家珍；生動活潑、饒富意趣，使得見聞不廣的村童們聽得出神，不禁心嚮往之。

中山先生幼讀私塾，教師多屬洪、楊革命時人，他們在洪楊起義時，也曾顯過身手，如今革命風雲消散，他們祇好埋名隱姓，在此授課之餘，喜談太平軍起義往事。「有一些參加過太平天國革命的老戰士閒來無事，時常到這個私塾來，給孩子們講太平天國的故事。講到金田起義，定都南京，打破江南、江北大營和曾國藩偽裝跳河自殺的時候，學生們個個眉飛色舞。」（註三七）這種類似白頭宮女話天寶軼事的現身說法，興緻盎然，尤足感人，學童們經常以此爲樂。中山先生更是聽得津津有味，樂此不疲。他聽說太平天國以推翻滿清異族統治爲目的，而且實行過許多社會改革的措施，深表贊同；惟對其內部不和，爲爭權奪利而互相殘殺，終至滅亡，頗覺痛惜（註三八）。又從這些老兵的談論中，探本尋源，鑑往知來，對明清兩代間的遞嬗史實了解深刻，於是在他幼小的心田中，已蘊育了排滿興漢的民族種籽。老兵見其眉宇之間英氣橫溢，言談中居然充滿了熱忱的種族意識，志向非凡，益加親暱；特別向他詳述當年作戰的實況，盛讚洪秀全其人其事。每以要做「洪秀全第二」期勉，他亦以此引爲榮幸。自是民族大義，蘊於胸臆；革命思想，油然而生。認爲洪秀全起自布衣，旨在驅逐異族，光復華夏。雖因種種因素，功敗垂成，及身自亡，固不能以成敗論英雄，因而深慕其人（註三九）。且對清廷顛覆無能，時加抨擊，鄉里故人咸表詫異，輒以「洪秀全」呼之，他亦以「洪秀全第二」自許。

中山先生因家境清寒，十歲始入鄉塾讀書。不久飢聞太平天國軼事，且常偕同學前往鄰村的武館參觀，這是他最早跟會黨外圍組織接觸的開始。蓋珠江三角洲是反清秘密結社特別活躍的地區，而香山縣夙多洪門會黨，爲民族思想發達地區。他們既不便正式的公開活動，乃設法借民間節日慶典時祭拜神祇（如供奉關公雲長，標榜忠義精神，多與會黨有關），或以民間技藝方式出之，如舞龍、舞獅、高蹺、演戲、燈謎等，類似活動皆在不知不覺中達到維護民間習俗，進而保存民族精神的目的。開設武館的宗旨，在本質上也是基於此而已。當然這更富有積極的作用，使會員們各個練得一身紮實而精湛的武藝，憑這套真本領、硬功夫，以備不時之需——抑強扶弱，或與清虜直拼。

翠亨村附近一帶的鄉村，如石門坑、信福隆、峨帽、大象埔、山門等地，都設有三合會的武館。中山先生於課暇時，常與鄉塾同學楊帝賀、孫梅生等，偷偷跑去那兒，觀看三合會會員練習技藝，他們個個肌肉發達，體格健壯、身子矯健、技藝高超，這對年幼好奇的學童們委實是一大誘惑，不禁嚮慕之至，一回到家后，便仿效他們舞拳弄棍起來。

其次，談到中山先生與洪秀全這兩位近代中國的革命領袖，確有許多相同或類似之處：其一、中山先生生於一八六六年，相距洪秀全逝世僅二年耳；香山縣距離洪之出生地花縣不過兩百多里，之皆係粵產，堪稱同鄉；而太平軍的壯舉曾震撼過香山成千上萬父老們的心田；孫先生對洪氏領導的平民革命，除嚮慕之外，當倍有親切感。其二、皆係基督教徒，誼屬同道。替洪秀全受洗的牧師何福（福堂），其子何啓乃香港西醫書院的創辦人、兼秘書及教授。兩代革命偉人師事何氏父子，亦一極富意趣之巧合也。其三、二人皆先習醫，嗣即棄醫而從事革命，且在倡導民族革命與社會改革等方面，頗多雷同之處，他倆既是「同行」，也是「同志」。誠然，若論學識、度量、見解與眼光，洪氏皆不能與中山先生相比。除了主觀的條件以外，這與時代背景與環境變遷都有關連，固不宜以今視昔，厚責前賢。

## 六

中山先生創導國民革命初期，首先以「驅除韃虜，恢復中國（華）」爲號召（註四〇），此與洪門「反清復明」的宗旨並無二致。誠如所云：「民族思想實吾先民所遺留，初無待於外鑠者也。余之民族主義，特就先民所遺留者，發揚而光大之。」（註四一）這裡所說的先民自然包括深受明末先賢行誼影響的洪門中人。不過洪門畢竟是異族專制統治下的產物

，它跟一般社會團體一樣，組成分子參差不齊，影響所及，利弊互見。因此中山先生對洪門會黨也就有褒有貶了。他所創始的革命，旨在實行三民主義。僅就民族主義而言，其革命對象除滿清政府外，還有列強帝國主義，而欲打倒後者，必先推翻前者。誠如蕭一山教授所指陳：

粵省爲天地會黨人聚集之地，在鴉片戰前，民族思想以「反清復明」爲事，及鴉片戰爭爆發，又轉爲驅逐英夷，外禦其侮。戰後見清軍禦侮不足，殘民有餘，則欲禦侮必先反清，此種思想之轉變，實爲後日革命策源於粵省之重要原因也。故鴉片戰爭前之舉義者，多在兩湖，戰後多在兩粵，自洪大全以迄 國父，皆受此反清攘夷二種思想之影響者矣。（註四二）

應該特別說明的是，中山先生雖然主張「反清」，却不以「復明」爲然。故其與會黨革命的宗旨不盡相同，而與洪秀全的看法相似，實又不然，因爲國民革命要創建民國。三民主義與其它主義不同，此一「民」字具有特殊意義（註四三）。這與專制時代的英雄革命，改朝換代，是不能相提並論的。至其自幼嚮慕洪秀全其人，並以洪秀全第二自許，這是一個愛國童年欽敬民族英雄的自然表露。並不意味著他全然贊同洪楊革命。一九〇六年冬，他在「中國同盟會軍政府宣言」中，有明白的昭示：

惟前代革命，如有明及太平天國，祇以驅除光復自任，此外無所轉移。在我等今日與前代殊，於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外，國體民生，尙當變更，雖經緯萬端，要其一貫之精神，則爲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。故前代爲英雄革命，今日爲國民革命。（註二五）。

中山先生學貫中西，知所取舍，截長補短，取精用宏。縱然是他所贊同的，往往也不「照單全收」；即使他反對的，也不會批評得「體無完膚」。基於晚近歷史的淵源，他確能承諸民族革命的優良傳統，但它僅是中山學術思想的一部分耳。他倡導革命，旨在救國濟民，而非一己權勢之爭，而其精深博大的遺教澤被後世，永垂不朽，尤非前賢所能及。

## 肆、結論

研究一代偉人的生平行誼、思想與志業等，茲事體大，殊非易事。縱使窮盡畢生的光陰與精力，亦未必能有大成。尤其像 國父孫中山先生這樣的曠世聖哲，其嘉言懿行、學術思想等，影響於後世者，極為深遠。宜乎西洋學者認為：孫中山不但是屬於中國的，也是屬於全世界的。

先生幼年處境足以影響其革命思想。他生長在人傑地靈的廣東，基於地緣之利，香山縣人最早知道中國之外，尚有西方世界存在。他倡導革命，首須組黨、募款，而海外華僑以廣東人最多，他們既富有，又很進步，每受僑居地官民的岐視與苛待，所以渴望自己的祖國強大起來。基於受了政治上的衝動，他們一經中山先生的領導，樂於效力，或慷慨輸將，支助革命；或回國參加起義，直與虜拼。更有很多的壯士兩者兼而有之。中山先生盛譽「華僑為革命之母」。數不清的革命史實，擺在吾人眼前，信而有徵，洵非虛譽。

閩粵人民很早來自中原，他們保持了固有的文化，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都十分強烈。滿清佔據中原，他們組織秘密結社，誓與異族周旋到底。清季政府腐敗，外患頻仍，他們把鬥爭的劍頭一方面針對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，一方面指向顛覆無能的清廷。洪、楊金田起義，正代表著廣大貧苦無以維生的群眾對這雙重壓迫的反抗。因為多方面的因素，太平天國終於敗亡，然而滿清政權却因此亮起了「黃燈」。漢族久受異族殘酷的統治，逐漸轉守為攻、否極泰來。無論怎麼說，中山先生自幼嚮慕洪秀全革命，太平天國對國民革命頗有啓導與鼓舞的重大作用。

兩廣一向是洪門會黨最活躍的地區，清季歷次的革命起義殆皆發動於此，尤以廣東為最，其地鄰近港、澳，密運械彈，支援較易。早期起義的敢死志士、革命先烈先進，十九都是廣東人，他們勇敢、自恃，極富冒險患難的精神；他們出錢出力最多；他們不顧身家性命，犧牲最為慘烈。可以肯定地說：廣東不愧為清季革命的發源地，中山先生是世界所公認的中國革命領導者。

## 附 註

註一：何大章「地理志初稿」(一)(吳相湘主編、「中山文獻」第八冊、台北、學生書局出版、民國五十四年三月)頁二五。

註二：吳相湘著「孫逸仙先生傳」(台北、遠東圖書公司印行、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)，頁六。

註三：祝淮主修、黃培芳等輯「香山縣志」(中山縣文獻委員會、民國三十七年編刊)。

註四：同註一，頁三一。

註五：同註一。

註六：孫文「上李鴻章書」(「國父全集」、台北、中央文物供應社、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、頁九)。

註七：劉鴻煥著「中山先生傳略」(重慶、獨立出版社、民國三十年十月出版)，頁一。

註八：案滿清於順治元年(一六四四年)入關，佔據北京。嗣因嚴防在台灣的鄭成功率軍反攻，厲禁閩粵人民「通海」，乃有「遷界」之苛政。康熙二十四年(一六八五年)，內陸平靖，清開海禁，設江、浙、閩、粵四海關。相距清入關，歷四十一年矣。雍正七年(一七二九年)，清始禁鴉片。乾隆二十二年(一七五七年)，始封禁江、浙、閩、粵四海關，距清開海關已七十二年。僅限廣州一口對外通商，相距道光二十二年(一八四二年)中英南京條約，開五口通商，廣州一地，對外通商，獨占鰲頭達八十五年之久。長久以來，外商不能直接與內地華人通商，金星港則可享自主權，當時其商業繁榮當可想見矣。

註九：林百克著、徐植仁譯「孫逸仙傳記」(重慶、中國文化服務社、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再版)，第一章翠亨。

註一〇：蔣廷黻「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」(蔣廷黻選集第三冊、頁五一九，台北、文星書店，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刊)。

註一一：同註七，頁二。

註一二：郭廷以著「近代中國史綱」（香港、中文大學出版社，一九八〇年），頁七二；「近代中國史事日誌」（台北、民國五十二年），頁一二二。

註一三：民國十二年二月，中山先生在香港大學演講「革命思想之產生」的主要內容時，如全所稱（國父全集、台北、中央文物供應社、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，頁捌一—一四六）。

註一四：孫文「革命思想之產生」（國父全集、第二冊、頁捌一—一五六）。

註一五：全上。

註一六：全註二，頁七。

註一七：方豪著「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」第二冊（香港公教真理會，一九七〇年九月），頁一八六—一九九。

註一八：馮炳奎著「中國文化與嶺南文化」（台北、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出版、三民書店經銷、民國五十一年六月），頁八二。

註一九：案中山先生出身於貧苦農家，祖父、父親皆為佃農，兩位胞叔及長兄則為苦力（Coolie Trade）。他七歲入私塾，課餘做工，隨二姊妙茜上山打柴、撈塘飄銀豬。稍長，下田除草、排水、牧牛；時而追隨外公楊騰輝先生駕舟出海取蠔，以彌補家中營養之不足（吃不起白米乾飯，而以白薯為主食）。這種艱苦的農村生活與家庭環境的影響，乃培養了他堅強的意志與後來從事革命的氣魄。（孫中山年譜、北平中華書局，一九八〇年七月，頁一至一〇）。

註二〇：蕭一山撰「從『洪門』祖宗談到與革命黨的關係」（台北、中興評論四卷四期、民國四十六年四月），頁四。

註二一：羅香林著「國父家世源流考」（重慶、商務印書館初版、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），頁三至八。

註二二：陶成章著「教會源流考」云：「南方之人智而巧，少迷信而多政治思想；北方之人直而愚，尚武力而多神權迷信。何以言之？曰凡山東山西河南一帶，無不尊信封神之傳，凡江浙閩廣一帶，無不崇拜水滸之書。故白蓮之教盛於北，而洪門之會遍於南。」

註二三：馮炳奎著「中國文化與嶺南文化」（台北、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出版、三民書局經銷、民國五十一年六月），頁八

二。

註二四：莊政撰「鄭成功與中國近代民族革命」（台北、福建會訊第五期、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一日），頁六至一〇。

註二五：同註二，頁二一。

註二六：同註二，頁三二。

註二七：同註二，頁二三。

註二八：同註二，頁二二至二五。

註二九：蔣廷黻著「中國近代史論叢」（台北、大西洋圖書公司、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初版），頁三〇五。

註三〇：案香山縣位於粵東，三面環海，與外國接觸最早。明末（嘉靖三十二年、西曆一五五三年），葡萄牙人已佔據澳門；香港未割讓英國（一八四二年），其地未繁榮前，金星港早與外國通商，且為外船無需納稅之自由港，縣民遠通南洋及美洲謀生者夥，當地久已成為中西文化所接觸的焦點。縣民得近水樓台之利，引起當地青少年留學的興趣。他們將所學的新知帶回來應用，對祖國政治社會提出了種種改革的意見，有助於中國未來的進步。中山先生於青年時在廣州、香港求學期間，所接觸的師友如區鳳墀、何欽、鄭觀應、鄭藻如、鄭士良、陸皓東、尤列、楊鶴齡、陳少白、楊衢雲、謝纘泰等，都曾至國外或外地大埠，接受西式教育。他們有的主張以緩進的方式改革不良政治，有的主張徹底革命，推翻滿清，中山先生早期思想很可能受了他們的影響，殆兩者兼而有之。

註三一：滿清入據中原，反清運動屢敗，而以東南最為慘烈。如：順治、康熙年間，反滿的民軍迭遭敗績，漢族被慘殺歷時一月之久，死者七十餘萬。遂使志士遺老，伏處山林，秘密結社。（張霄銘著「太平天國革命史」上海神州出版社、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初版，頁一一一）。

註三二：同註一，頁三。

案連雅堂正式筆之於史書，在其所著「台灣通史」云：「吾聞延平郡王入台之後，深慮部曲之忘宗國也，自倡天地會而為之首，其義以光復為歸。延平既沒，會章猶存，數傳之後，遍及南北，且橫渡大陸，浸淫於禹域人心，今之閩粵，尤昌大焉。婆娑之洋，美麗之島，唯王在天之靈，實式憑之，然則台灣之人，固當以王之心為心也。」

註三三：同註一，頁五。

註三四：同註一，頁三。蕭一山認為洪門不但內容是革命黨，而且「革命」兩個字，也是其所提出。

註三五：吳相湘編撰「孫逸仙先生傳」（台北、遠東圖書公司、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），頁一二。

註三六：蕭一山教授說：「從歷史上看：天地會是一民主義，太平天國是二民主義，國民革命是三民主義。不過，一民二民都是單純的政策而已，國父却把中西文化加以融滙貫通，完成三民主義的建國原理，含有一種歷史哲學的意味，和一民二民都大不相同了。然而溯流追源，其由來如此。」（全註一）

註三七：「偉大的孫中山」（國民黨大陸工作會藏書），頁五。

註三八：蔣星德著「國父孫中山先生傳」（台北、正中書局、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四版），頁一六〇。

註三九：孫文撰「太平天國戰史序」（「國父全集」第三冊、台北、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、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，頁拾貳—三）。

註四〇：馮自由著「華僑革命開國史」（台灣商務印書館、民國四十二年八月），頁二六。

註四一：「孫文自傳」革命之主義（「國父全集」第二冊，頁柒—九〇）。

註四二：蕭一山著「清代通史」（台灣商務印書館、民國五十二年四月台初版）第四冊，頁三。

註四三：崔載陽著「國父思想之哲學體系」（台北、中央文物供應社、民國五十七年二月再版），頁二七。